

本刊6月號刊出了趙鼎新教授的文章〈當前中國最大的潛在危險〉，探討中國公共輿論兩極化的問題，在網絡上和不少微信群組中引起了頗大的爭議。暫且不論各方發表的正反意見，倒可肯定的是，這是一個相當具爭議性的話題，而且非常值得各方持續深化討論。我們很歡迎各界賜稿，評論文中的觀點，進一步探討相關問題。

——編者

## 公共輿論的「左右對峙」

2018年以來，一種對中國政治改革「走回頭路」的憂慮感在中國知識份子中蔓延開來。然而，趙鼎新的〈當前中國最大的潛在危險〉（《二十一世紀》2019年6月號）認為，中國公共輿論領域中「左」、「右」兩派立場的日益極端化，是一個更讓人擔憂的問題。公共輿論領域出現了「左右衝高、中間走低」的雙峰對峙格局，對中國政治穩定極為不利。作者認為，有助於政治穩定的公共輿論形態有兩個特點：一是觀點的多樣性；二是觀點的居中性。

有趣的是，作者在文章中指出，2003至2014年間，中國曾出現有利於政治穩定的公共輿論形態：被稱為「自乾五」的鬆散群體在公共輿論中嶄露頭角，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右翼」形成制衡，公共輿論呈現出多樣性與居中性的特徵。但是自2014年開始，以原中國網信辦主任魯煒為代表的「雙面人」左派運用國家權力干預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公共輿論，使得溫和左翼及自由主義右翼的輿論空間驟然縮小，而左翼極端派別卻獲得更多的空間。這導致左翼觀點日益極端化，同時也使右翼知識份子因受壓制而獲得大眾的道德同情，最終出現雙峰對峙格局。政府試圖控制公共輿論來維護政治穩定及其合法性，卻帶來了危及政治穩定的相反結果。這或許是這篇文章最重要的啟示。

但是，在提供建議時，作者並沒有因此提出言論自由、約束政府權力等主張，反而在治國策略上提醒當局注意「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並重申鄧小平的政治智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作者寄希望於國家與領導者主動「開放思想與言路」，其效果如何，卻讓人頗感疑慮。中國公共輿論一直處於國家權力的高度監控下。借用鄒讜的概念，所謂言論空間只不過是國家權力的一個「不介意領域」(zone of indifference)。言論空間的大小及其價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是否「介意」與干預。就此而言，作者呼籲國家不要太「介意」公共輿論的各種聲音，無疑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然而從長期來看，如何找到可行的、有效的權力約束機

制，保障公民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更是中國公共領域建構急需解決的問題。

文明超 廣州

2019.6.13

## 大歷史語境中的五四運動

在〈現實政治中的五四運動〉（《二十一世紀》2019年6月號）一文中，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分別從相互激盪的域內與域外兩個維度來分析五四運動的成因，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與說明力。就域內因素而言，集中體現是辛亥革命後一再陷入危機的憲政建設，「令中國管治架構的基本問題懸而未決」。然而遺憾的是，作者「畫龍」卻沒有「點睛」：造就此等現實的根源在於彼時中國缺乏有效的政治整合途徑。誠然，以《清帝遜位詔書》呈現的「大妥協」，為民國的主權廢續提供了法律框架，但這只是搭建了一個粗線條的權力框架，對於共和建設應如何進行，並未達成真正穩固的精英共識。若觀察辛亥革命到中共建制這段近乎「滾石頭下坡式」的激進主義歷史進程，我們就不難發現由「分權」走向「集權」這一明顯脈絡，而其間政治精

英屢番嘗試皆無法達致目的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缺乏落實政治整合的具體機制，尤其是缺乏承擔這一政治整合使命的恰當的力量載體。當通過議會進行政治整合（「主權在民」）與通過公共行政整合（「主權在國」）均告失敗後，中國出現的是通過新型革命政黨進行政治整合的路徑。放寬歷史視野，或許只有將「五四」納入分析框架，方能對其進行更為客觀與全面之評判。

就域外因素而言，方文大體認為，沒有一戰，何來五四？圍繞山東問題，日本與英美在巴黎和會上的「反目成仇」，造就了影響中國政局的「霍布斯的夢魘」（Hobbesian nightmare）。這一觀察可謂高屋建瓴。十九世紀以降，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全球性的局勢，外圍區域的革命和變革往往是在內外互動中形成。這就意味着，近代中國的共和轉型不僅深受域內因素影響，還受制於諸多源自域外的結構性制約。作為佐證，方文雖在北洋謀求參戰問題上着墨甚多，但卻並未結合變遷的國際格局對一敗一成前後兩次不同經歷的內在成因進行深度提煉，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論證力度。

事實上，1915年中國參戰受阻原因有二：其一，日本不願中國加入協約國，蓋因其對華別具野心，深恐中國參戰後，國際地位轉變，不能對華為所欲為。其二，在協約國看來，日本協濟遠比中國參戰更為重要，畢竟日德媾和甚或勾結，對它們而言形同惡夢，為此，協約國彼時不僅拒絕中國參戰，更讓日本主導協約國的遠東政策。1917年順利參戰原因亦有二：其一，面對日本戰

時在華勢力全面膨脹，美國暫時缺乏餘力加以抑制，故轉為將問題的最終解決留待戰後。作為緩衝，美國拉攏中國對德宣戰。通過加強其在和談中的地位，用以牽制日本對華之擴張。其二，日本此時預料歐戰即將結束，在中國問題上，列強對其將從戰時容忍轉為戰後遏制，為了確保在華「特殊權益」，必須先發制人，化被動為主動，轉而督促中國參戰以圖削弱美國對華的影響力，從而鞏固其在中國的領導地位。

魏磊杰 廈門

2019.6.28

## 「真實電影」與「直接電影」

在王暹的〈中國「新紀錄運動」理論獻疑〉（《二十一世紀》2019年6月號）一文中，作者對呂新雨關於「新紀錄運動」第一階段即1990年代初以紀實主義為特徵的紀錄片理論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當時不存在「純觀察」和「直接電影」，而是「真實電影」。

讓我們回到歷史中去辨析「真實電影」。1914年，美國導演弗拉哈迪（Robert J. Flaherty）拍攝的《北方的納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奠定了一種深入當地，與被拍攝者親密合作、信任共享的紀錄片拍攝方式；他花了一兩年時間與拍攝對象生活在一起，直到故事「脫穎而出」。1960年，法國人類學家胡許（Jean Rouch）與社會學家莫蘭（Edgar Morin）所拍攝的紀錄片《一個夏天的記錄》（*Chronique d'un été*），真正實踐了「真實電影」。這兩位電影人堅信：拍攝者不是躲在攝影機後面的人，而應該積極參與

被拍攝者那一刻的生活，促使被拍攝者與之合作，講出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態。

1994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播出的紀錄片《雲之南》（*China: Beyond the Clouds*）就是一部具有「真實電影」特點的紀錄片，講述1990年代初雲南麗江古鎮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故事。在紀錄片開拍前，導演阿格蘭德（Phil Agland）帶領團隊在麗江生活了一年，在麗江古鎮裏轉悠、聊天，真正參與當地的生活。導演以一種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式，與當地人平等、真摯地交流。

王文所提到的1990年代初的紀錄片，與《雲之南》存在着眾多相似性：並不避諱創作主體性的凸顯，「它承認、甚至主動強化創作者自身在影片中的形象、聲音、態度、觀念、行為」。例如在《望長城》（1991）中，主持人焦建平採取平行的視角與平和的口吻，與在長城邊生活的民眾打成一片。焦建平與長城邊民相互信任、親密合作，發掘出不少鮮活的故事，展示出長城邊民一種真實的生活狀態。

與「真實電影」植根於人類學觀念不同，「直接電影」更多受新聞攝影的影響。其主要美學觀是：將製作者的干預降低到最低限度，減少或者不要解說和音樂，絕不能明顯地強加拍攝者主觀意圖。直到1990年中期出現的紀錄片，如《廣場》（1994）、《八廓南街16號》（1996）、《陰陽》（1997），才真正宣告「直接電影」在中國的誕生。

楊俊芳 廈門

2019.6.11